

域外漢籍傳播與中韓詞學交流

한국의 해외 선파와
중국 시학 교류

月夜
兩人
車馬
草圖



杨焄 著

上海

域外漢籍傳播與中韓詞學交流

한적의 해외 전파와
중한 사학 교류

杨焄 著



上海古籍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域外汉籍传播与中韩词学交流 / 杨焄著.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7.9
ISBN 978-7-5325-8587-8

I. ①域… II. ①杨… III. ①词学—研究—中国、韩国
IV. ①I207.23②I312.607.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7)第 209624 号

域外汉籍传播与中韩词学交流

杨 焄 著

上海古籍出版社 出版

(上海瑞金二路 272 号 邮政编码 200020)

(1) 网址: www.guji.com.cn

(2) E-mail: guji1@guji.com.cn

(3) 易文网网址: www.ewen.co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中心发行经销

惠敦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890×1240 1/32 印张 11.25 插页 2 字数 272,000

2017 年 9 月第 1 版 2017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325-8587-8

I·3208 定价: 48.00 元

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承印公司联系

本书为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
“域外汉籍传播与中韩词学交流研究”（11CZW045）结项成果，
并得到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学术著作出版基金资助。

目 录

引 言	001
第一章 汉籍环流背景下的韩国词论与词作	007
第一节 中韩文化交流进程中的汉籍环流现象	008
一、颁赐与征求	009
二、进献与购置	018
三、寻访与交流	031
第二节 韩国文人对中国词作的评论与效仿	049
一、韩国文人对中国词作的评论	050
二、韩国文人对中国词作的仿效	059
第二章 域外汉籍的传播、影响和价值	071
第一节 陆机《文赋》在韩国的流传与影响	072
一、《文赋》对韩国历代文学创作的影响	074
二、《文赋》对韩国历代文学评论的影响	079
三、《文赋》在韩国文化其他领域中的影响	084
四、杜甫《醉歌行》在韩国的接受与《文赋》对韩国的 影响	086
第二节 锺嵘《诗品》在韩国的流传与影响	091

一、韩国历代文人对锺嵘及其《诗品》的评论	091
二、韩国历代诗文创作与锺嵘《诗品》	099
第三节 朝鲜刻本《樊川文集夹注》的文献价值	118
一、《樊川文集夹注》的注者及成书时间	119
二、《樊川文集夹注》文本的校勘价值	124
三、《樊川文集夹注》注文的文献价值	130
第四节 朝鲜刻本《精刊补注东坡和陶诗话》的文献价值	135
一、保存早期陶渊明年谱佚文	138
二、保存早期苏轼年谱佚文	142
三、保存多种宋人《和陶集》注文	144
四、征引多种宋人诗话著作	148
五、保存蔡正孙补注及按语	150
六、版本校勘价值	153
 第三章 汉籍东传与韩国櫟括词的创作	156
第一节 崔执钧《剔银灯》与范仲淹《剔银灯·与 欧阳公席上分题》	159
第二节 郑球《清平乐·管城子》与韩愈《毛颖传》	164
第三节 申光汉《忆王孙·戏赠童女八娘》与杜牧 《叹花》	171
第四节 洪迪《念奴娇·北窗清风》与陶渊明诗文	176
第五节 赵冕镐《洞仙歌·櫟括〈桃李园序〉》与李白 《春夜宴从弟桃花园序》	183
 第四章 韩国词人对中国词作的步和与拟效	192
第一节 韩国历代和苏轼词论	193

一、韩国历代和苏轼词的形式要素	195
二、韩国历代和苏轼词的内容特质	206
三、韩国历代和东坡词中的异代追和与同时酬唱	215
第二节 韩国历代拟朱熹词论	219
一、韩国历代拟朱熹词的类型	221
二、韩国历代拟朱熹词的创作特征及创作心态	228
第五章 韩国历代“八景”词及相关衍生词作	244
第一节 李齐贤与韩国历代“潇湘八景”组词	246
第二节 韩国历代本土“八景”组词及其衍生	265
第六章 高丽李齐贤的词作及其在中国的传播与接受	282
第一节 金元词坛风尚及对李齐贤词作的影响	285
第二节 金元词在高丽的流传及对李齐贤创作的影响	292
第三节 李齐贤词作在近现代中国的传播与接受	300
结 语	323
主要参考文献	326
后 记	353

引言

在相当漫长的历史时期中,古代东亚地区的众多国家如日本、韩国等,都曾经受到中国文化的深远影响,其突出表现之一即共同使用汉字作为通行的书面表达语言。在某种层面上,甚至可以认为“汉语成了东亚的‘拉丁语’,对所有的文化产生了启迪,其程度远远超过了拉丁语在西方的影响”。^① 这些国家由此对汉字文化产生了极为强烈的认同感和归属感,尽管在日常口语表达中使用的仍然是各自的民族语言,但在书面表达时却往往采用汉字作为载体,由此也就产生了“域外汉文学”这样一种独特的文学样式,并形成自身独特的承传谱系。

在“域外汉文学”得以产生与递嬗的背后,折射出的乃是突破民族与疆域界限的整个东亚地区的文化交流活动,其中尤以汉籍的传播最为关键。本书即尝试在域外汉籍传播的背景之下,着重考察中、韩两国在词学领域的交流互动。在研讨之前,有必要对相关术语、概念做一番界定,同时也对现有研究状况做一番简要的回顾。

所谓“域外汉籍”,有狭义和广义的不同理解,尚存在一定的分歧。就狭义而言,专指源自中国本土而流传、保存于韩国、日本、越

^① (新西兰)史蒂文·罗杰·费希尔:《阅读的历史》,李瑞林、贺莺、杨晓华译,党金学校,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年,第93页。

南等数个周边国家的汉文古籍(包括钞本和刊本);就广义而言,则还包括以中国典籍为依据,进行抄写、翻刻、笺注、选评的各类汉文古籍(例如朝鲜本、和刻本、越南本等),以及域外文士使用汉语进行撰著的各种典籍。在实际研究的过程中,采纳狭义的理解固然有助于划定适度的范围,但在涉及具体典籍的递传情况时,并非都能完全做到此疆彼界,泾渭分明,而且也无助于展现以书籍传播为中心的东亚地区文化交流的全貌。本书将要研讨的《精刊补注东坡和陶诗话》,出自宋元之际蔡正孙(1239—?)之手,但目前仅存三种朝鲜时期翻刻的残本,就暂时无从考察此书最初是经由何人通过何种途径传入韩国的。^①如果拘泥于狭义的理解,对于这一类在中国本土佚失的典籍难免就会失之交臂。基于这样的考虑,本书更倾向于对“域外汉籍”这一术语采用广义的理解。

另一个需要界定的概念则是“中韩”,具体而言就是“中国”和“韩国”这两个我们习以为常甚至习焉不察的称谓。历史上伴随着王朝的兴替、民族的分合、疆域的伸缩,其实并不存在固定不变的“中国”和“韩国”的空间概念。我们所理解的国家,在很大程度上都是从现在的具体处境出发,尤其受到近代以来日趋鲜明的民族国家观念的影响,因此往往会忽略很多原本存在着的差异性历史要素。然而,正如有学者质疑的那样:“真的有这样的一个具有同一性的‘中国’吗?这个‘中国’是想象的政治共同体,还是一个具有同一性的历史单位?它能够有效涵盖这个曾经包含了各个民族、各朝历史的空间吗?各个区域的差异性能够被简单地划在同一的‘中国’里吗?”^②类似的疑问也可以转移至“韩国”这个概念之

① 参见本书第二章第四节《朝鲜刻本〈精刊补注东坡和陶诗话〉的文献价值》。

② 葛兆光:《宅兹中国——重建有关“中国”的历史叙述》,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第3页。

上,从传说中的箕子率众开拓朝鲜半岛,到高句丽、百济、新罗鼎峙的三国时期,在经历了新罗统一全国之后,又相继建立了高丽、朝鲜两个王朝,近代以来又曾沦为日本殖民地,直至目前尚呈现南北对峙的政治格局,到底哪个才是“韩国”?鉴于本书所涉及的历史时段将从公元六七世纪一直延续到近现代,为了强调历史的延续性和文化的同一性,也为了便于指称,一般仍笼统地使用“中国”、“韩国”的称呼,而在涉及具体时间段时,为了便于细分再使用相应的王朝称谓。

由韩国历代文士创作的汉文学作品数量颇夥,其中的词作虽然并不是主要部分,但相关的研究成果仍有一些,目前学界对此已经有过简要的介绍。韩国学者金贞熙在《韩国“中国词文学研究”评述》中专设一节考察“韩国词文学研究”的基本情况,其中提到:“韩国词文学研究成果有达 22 篇之多,除了车柱环的对于韩国词文学资料整理及朝鲜末期的高圣谦和金时习研究外,大致上局限在高丽末词人李奎报和李齐贤的研究上,因此可以说尚有许多研究课题,等待探究。”^①而中国学者薛玉坤在《韩国学者词学研究著作、论文索引(1958—2004)》中则开列过一份包括专著、硕博论文及专业刊物论文在内的目录,^②虽然因为涉及面较广,搜集的资料尚不完备,但也可以发现绝大部分研究的对象都集中于中国词人词作,仅有一小部分涉足韩国词。这两位学者考察的时间下限都截止到 2004 年,侧重于介绍韩国学界的研究状况,且重心并不在于韩国词文学,因而难免有所遗漏。综观目前中、韩两国学界在这方面的研究,可以将相关成果依照性质分为文献资料的整理校订

① (韩)金贞熙:《韩国“中国词文学研究”评述》,载(韩)中国语文研究会编《中国语文论丛》第 29 辑,2005 年。

② 薛玉坤:《韩国学者词学研究著作、论文索引(1958—2004)》,载《中国韵文学刊》2005 年第 3 期。按:这份索引还将中国学者著作的韩译本列入其中,体例稍显不纯。

和词史词作的考述评析两大类。以下略作回顾介绍,并对其中可供进一步开拓的领域加以说明。

对韩国历代词作进行系统性整理校订的工作,开始于上世纪六十年代。韩国学者车柱环在主持韩国历代文集的整理计划时,搜集了自高丽至朝鲜时期共 43 位文人的词作 431 首,逐一加以标点和说明,并以《韩国词文学研究》为题,在 1964 年至 1965 年期间,陆续公开发表。^①他事后曾颇为感叹地说:“这件韩国历代长短句的搜探梳理工作也相当吃力,而且需要不断查阅中国各家词集、词谱等等有关词学的文献。”^②受研究条件和个人精力所限,这项工作最终并未能够持续进行。不过,随着《韩国文集丛刊》这样大规模的古籍整理项目的推进,^③为其他学者搜集、整理韩国词作提供了极大的便利。另一位韩国学者柳己洙经过多年努力,在 2006 年推出整理校点本《历代韩国词总集》,主体内容分为《高丽、朝鲜词》、《有目无词》、《失调名、自度曲》和《汉文小说中的词》四类,共计收录 171 位文人的 1 250 余首词作,^④基本呈现了韩国历代词作的整体面貌。其后有学者针对书中部分讹误提出过批评商榷,^⑤柳己洙本人也陆续发表过《〈历代韩国词总集〉补正记》、《中國詞의 受容과 創作——새로 발견된 高麗·朝鮮詞를 中心으로》等具有订

① 《韩国词文学研究》共分五部分,相继发表在《아세아연구》(《亚细亚研究》)第 7 卷第 3、4 期和第 8 卷第 1、3、4 期。

② (韩)车柱环:《北宋怀古词小考》,载《词学》编辑委员会编《词学》第十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2 年,第 1—2 页。

③ 《韩国文集丛刊》由韩国民族文化推进会(现为韩国古典翻译院)主持编辑影印,收录上起新罗时代,下迄近代的韩国文集,目前已出版 350 册,共计 663 种文集。

④ (韩)柳己洙编:《历代韩国词总集》,오산:한신대학교출판부,2006 年。

⑤ 参见杨焄:《〈历代韩国词总集〉匡补》,载《中国语文论译丛刊》第 25 辑,중국어논문역학회,2009 年。

补修正性质的论文,^①使得目前搜集到的韩国词作总数已经达到2000首左右,为日后的深入研究奠定了较为坚实的资料基础。在中国学界,虽然没有类似的大规模系统整理,但对个别韩国词人也颇有关关注。清末伍崇曜出资、谭莹校勘编订的《粤雅堂丛书》中率先收入高丽文人李齐贤的《益斋乱稿》,其中包括《益斋长短句》一卷。近代词学家朱孝臧在其编纂的《彊村丛书》中根据明刊本校订,也收录过李齐贤的《益斋长短句》。其后唐圭璋在编纂《全金元词》时同样收录了李齐贤的全部词作,并撰写过系列论文考察其中的文字校勘问题。夏承焘选校的《域外词选》则以《彊村丛书》为底本,同时参酌唐圭璋的意见,选入李齐贤的全部词作并逐篇予以注释。^②就整体而言,目前中国学者在文献整理方面集中于李齐贤一家,涉及范围并不广,但对韩国词在中国的传播与接受也做出了不少贡献。

在对韩国词史词作进行研究时,既有针对个别词人词作的分析,也不乏宏观系统的研讨。前者如车柱环《韩中词文学的比较研究:以李奎报的白云词为中心》、池荣在《益斋李齐贤其人其词》、李宝龙《朝鲜文人词之先声——金克己词论析》、조창록《玉垂 趙冕鎬의 “詞”에 대하여》等,^③主要集中研讨金克己、李奎报、李齐贤、赵

① (韩)柳己洙:《〈历代韩国词总集〉补正记》,载《民族文化》第39辑,2012年;《中國詞의受容과創作——세로 발견된高麗·朝鮮詞를中心으로》,载《중국학연구》제65집,2013年。

② 有关中国学者对李齐贤词的整理工作,请参见本书第六章第三节《李齐贤词作在近现代中国的传播与接受》。

③ 参见(韩)车柱环:《韩中词文学的比较研究:以李奎报的白云词为中心》,原收入作者《中国词文学论考》(首尔:首尔大学校出版部,1982年),另有林秋山中译本《高丽与中国词文学的比较研究》,载《词学》编辑委员会编《词学》第九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2年;(韩)池荣在:《益斋李齐贤其人其词》,载《词学》编辑委员会编《词学》第九辑;李宝龙《朝鲜文人词之先声——金克己词论析》,载《延边大学学报》2011年第2期;조창록:《玉垂 趙冕鎬의 “詞”에 대하여》,载《한문학보》Vol.12,우리한문학회,2005。

冕镐等在韩国词史上卓有成就的词人；后者如吴肃森《朝鲜的词学》、罗忱烈《高丽、朝鲜词说略》、李承梅《조선 전기 詞文學 인식과 그 특성》、李宝龙《韩国高丽词文学研究》等，^①从整体上对韩国词学发展、演进的过程进行深入分析。由以上两种不同的研究视角切入所取得的成果，从不同层面展示了韩国词作的创作特征，为后续的研究提供了不少借鉴和启发，但在研究视域方面仍存有进一步开拓的空间。尽管有些学者已经开始尝试将韩国词作放置在中韩文化交流的背景下予以研讨，如黄拔荆《试论中国豪放派词风对朝鲜词人李齐贤的影响》、柳基荣《苏轼与韩国词文学的关系》、赵维江《汉文化域外扩散与高丽李齐贤词》、吴熊和《高丽唐乐与北宋词曲》等，^②但大部分的研究仍集中于词作本身的传播和接受，未能进一步在汉籍整体交流的进程中加以考察，以致在很多情况下只能聚焦于苏轼这样对韩国词史影响较为直接的中国文人，或是像李齐贤那样留存词作较多的韩国文人，在纵深度和覆盖面上都存有缺憾。有鉴于此，本书着重通过考察域外汉籍的传播过程来展示中韩词学的双向交流过程，以期进一步拓宽和深化对于韩国词文学的认识，并有助于凸显东亚地区汉文学传统形成和发展的轨迹。

① 参见吴肃森：《朝鲜的词学》，载《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1986年第1期；罗忱烈：《高丽、朝鲜词说略》，载《文学评论》1991年第3期；（韩）李承梅《조선 전기 詞文學 인식과 그 특성》，载《韓國漢文學研究》Vol.36，韓國韓文學會，2005年。

② 参见黄拔荆：《试论中国豪放派词风对朝鲜词人李齐贤的影响》，载《国外文学》1990年第2期；（韩）柳基荣：《苏轼与韩国词文学的关系》，载《复旦学报》1997年第6期；赵维江：《汉文化域外扩散与高丽李齐贤词》，载《民族文学研究》2010年第2期；吴熊和：《高丽唐乐与北宋词曲》，载《吴熊和词学论集》，杭州：杭州大学出版社，1999年。

第一章 汉籍环流背景下的 韩国词论与词作

由于对汉字文化具有极其强烈的认同感和归属感,古代东亚地区的诸多国家共同构建起规模庞大的“汉字文化圈”。运用汉字书写的大量文献典籍,在这些国家之间通过各种途径得以广泛的传播和接受,毫无疑问既是这种认同感和归属感所导致的必然结果,又是强化这种认同感和归属感的最有效手段。作为“汉字文化圈”的重要组成国家,韩国的古典文学作品中有相当一部分都是直接使用汉字进行创作的;而作为韩国历代汉文学创作中的一个分支,词体文学的产生和发展自然也不能脱离汉籍流通的大背景。惟有对汉籍在传播与接受过程中所出现的诸多复杂情况有整体宏观的了解和局部细致的考察,在研究韩国历代词体文学的嬗变过程中,才能够有较为翔实而真切的认识。

正是基于上述原因,本书在研讨过程中才格外强调将“域外汉籍传播”和“中韩词学交流”这两个议题密切结合在一起。不过,正如有学者所指出的那样:“在东亚书籍史的研究中,以往的工作偏重在汉籍的‘东传’或‘回流’,而较少着眼于‘环流’。无论曰‘东传’或‘回流’,其考察的路径往往是单向的,而‘环流’的视角所见者,则是曲折的、错综的、多元的流动,而且这种流动还是

无休止的。”^①尽管因为论题所限,本书无法将对于“域外汉籍传播”的考察进一步拓展至日本、越南等相关亚洲国家,但仅就中、韩之间的典籍传播和接受情况而言,我们以往也确实习惯于从自身所处的立场出发,侧重考察书籍文献从中国向韩国的单向输出,而相对忽略由韩国向中国的反向回传,更容易漠视两国之间彼此往复叠加的交流互动。本书着重考察的焦点集中于“中韩词学交流”这一议题,因而不仅需要关注韩国历代文人在倚声填词之际是如何学习、借鉴、摹拟源自中国词作的体式、题材和技巧,同时也需要反观韩国词作是在何种情况之下进行新创以及变异,乃至在中国得以传播和接受的种种复杂情况,由此也就更需要对中、韩文化交流过程中所出现的汉籍环流状况有一个整体的把握。

第一节 中韩文化交流进程中的汉籍环流现象

毋庸置疑,在中、韩两国文化交流的进程之中,中国始终处于极为主动而强势的地位,更多呈现的是输出而非输入的态势。但从韩国的立场来看,不仅存在着对传入的中国汉籍加以翻印摹刻,乃至进一步深入吸纳和广泛接受的情况,韩国汉籍——包括在韩国刊印的中国典籍以及韩国历代文人用汉语撰写的各类文献——也在以各种不同的方式回传至中国,并引发中国文士一系列相应的关注和互动,从而构成中、韩之间汉籍环流的完整图景。

详尽细致地考察双方在汉籍传播过程中所出现的各种复杂情况当然是不可能的,也并不是本书研讨的重点所在。本节拟从“颁

^① 张伯伟:《书籍环流和东亚诗学——以〈清脾录〉为例》,载《中国社会科学》2014年第2期。相似的表述又见张伯伟:《明清时期女性诗文集在东亚的环流》,载《复旦学报》2014年第3期。

赐与征求”、“进献与购置”以及“寻访与交流”这三个角度,着重对中、韩两国在汉籍环流背景下出现的一些特殊现象加以研讨。需要特别予以说明的是,如此分类主要是为了论述方便起见,这三者之间并非此疆彼界,泾渭分明,而是彼此关涉,时有关联,在分析讨论时挂一漏万也势所难免,最终目的只在于帮助我们对韩国历代词作和词论得以产生的复杂背景有一个相对细致真切的把握。

一、颁赐与征求

中、韩两国之间依托书籍文献而进行的文化交流很早就已经展开了,虽然西周时期箕子率众将诗书礼乐、医巫阴阳卜筮等书携至朝鲜的传说无法证实,但至迟在新罗、高句丽和百济三国鼎峙的时期,中国的各类典籍就已经大量流传至朝鲜半岛。现存不少文献史料中都留存着中国官方将汉文典籍颁赐给韩国的记载,北宋初年的王溥(922—982)在《唐会要》中记载道:

垂拱二年二月十四日,新罗王金政明遣使请《礼记》一部并杂文章。令所司写吉凶要礼,并《文馆词林》采其词涉规诫者,勒成五十卷,赐之。^①

提到了唐武则天垂拱二年(686)时颁赐新罗国王典章文献的情况。高丽时期的史家金富轼(1075—1151)在《三国史记》中也记录了新罗国于神文王六年(686)二月,“遣使入唐,奏请《礼记》并文章。则天令所司写吉凶要礼,并于《文馆词林》采其词涉规诫者,勒成五十

^① (宋)王溥:《唐会要》卷三十六《藩夷请经史》,北京:中华书局,1955年,中册,第667页。

卷,赐之”^①,可与中国史籍所载相互印证,足见所言非虚。其中提及的《文馆词林》分类纂辑先秦至唐代的诗文作品,共计一千卷,修纂完成于唐高宗显庆三年(658)^②,相距此次颁赐不足三十年。虽然全书卷帙浩繁,此番传入的只是其中一小部分“词涉规诫”的内容,但对于韩国文士了解此书,并进而搜求寻访,无疑提供了非常重要的线索,朝鲜王朝正祖时期的学者韩致雍(1765—1814)在《海东绎史》中就曾著录过《文馆词林》。^③类似的官方颁赐,在此后的中、韩文化交流中也时有发生,如北宋“淳化四年、大中祥符九年、天禧五年曾赐高丽《九经书》、《史记》、《两汉书》、《三国志》、《晋书》、诸子、历日、圣惠方、阴阳、地理书等”^④;元代延祐元年(1314),“帝遣使赐王书籍四千三百七十一册,皆宋秘阁所藏”^⑤。到了朝鲜王朝成立之后,由于一直与中国保持着极为密切的藩属关系,仍然会时常从后者那里获得书籍颁赐,相关情况在《朝鲜王朝实录》中屡有记载,如朝鲜太宗恭定大王三年(1403),即明成祖永乐元年,得到明朝诸多赏赐,其中包括“《元史》一部、《十八史略》、《山堂考索》、《诸臣奏议》、《大学衍义》、《春秋会通》、《真西山读书记》、《朱子全书》各一部”等典籍^⑥。有时朝鲜方面还会主动向中国提出要求,

① (高丽)金富轼:《三国史记》卷八《新罗本纪·神文王》,首尔:景仁文化社,1977年,第71页。

② (宋)王溥:《唐会要》卷三十六《修撰》:“(显庆三年)十月二日,许敬宗修《文馆词林》一千卷,上之。”中册,第656页。

③ (朝鲜)韩致雍:《海东绎史》卷四十四《艺文志三·经籍三·中国书目一》,张伯伟编《朝鲜时代书目丛刊》,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第五册,第2578页。

④ (宋)苏轼:《论高丽买书利害札子三首》其三,《苏轼文集》卷三十五《奏议》,孔凡礼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三册,第1000页。

⑤ (朝鲜)金宗瑞:《高丽史节要》卷二十四,韩国:明文堂,1981年,第552页。按:“帝”指元仁宗,“王”指高丽忠肃王。

⑥ 吴晗辑:《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上编卷二,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第一册,第194页。